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〇八期 ——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308d)

【史海钩沉】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的？	朗 钧
【亲历者说】	我所经历的“六一八”事件始末	马洪路
【心灵创伤】	寻找“文革”隐伤者——研究“文革”遗伤的心理学者	范承刚等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九）	孙怒涛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的？
——就“林彪事件”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与林彪拥趸的商榷

• 朗 钧 •

关于“林彪事件”的陈述，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很少有人在研究文章中谈及毛泽东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这段史实。而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这个问题则更被文革研究专家们所忽视。本文将就这个问题做一些讨论。

一、毛泽东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

高文谦先生所著《晚年周恩来》的第五章中有一小节，题为“毛、林交恶的根由”。其中透露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史实：

中共“九大”闭幕之后，毛泽东曾带着张春桥到苏州看望林彪。以谈如何防止出现修正主义为名，毛泽东试探林彪的态度，同时不动声色地挑动林彪对张春桥的忌心。毛泽东在谈话中先是说总理年纪大了，问林彪对周总理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然后话锋一转，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又问：你看小张（指张春

桥)怎么样?弄得林彪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后来林彪还是借着谈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时,才拐弯抹角地表示: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林彪已明显感到毛有改变接班人的考虑,预感到自己的前途凶险。为此,林彪和叶群俩人在苏州时,曾为此关起门来相对落泪〔1〕。

高文谦先生将毛泽东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简称“毛向林荐张”)这件事定义为“毛林交恶”的根由,还说,毛林苏州谈话“是解读庐山会议前后这段扑朔迷离历史的一把钥匙”——这是很到位的评述。

关于“毛林苏州会面”,除了高文谦先生的书中有所记载,《邱会作回忆录》中也有过一次关于毛泽东和林彪的苏州会面的记载。高文谦先生所说“毛林苏州会面”的时间是发生在“九大”之后,具体时间没有写明。而邱会作版本的“毛林苏州会面”说的很明确——1970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路过苏州时,和林彪有过一次会面。邱会作还说“毛林苏州会面”那天正好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至于毛林这次苏州会面时张春桥是否在场,邱会作没有说。邱会作只是说,毛泽东在和林彪的谈话中夸奖了黄、吴、李、邱这些“红小鬼”〔2〕。

那么,毛泽东去苏州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的具体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呢?

二、毛泽东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的确切时间?

1969年4月24日中共“九大”闭幕。之后,毛泽东和林彪的行踪大致如下:

资料显示,“九大”闭幕后,毛泽东和林彪没有立即离开北京。

1969年5月31日毛泽东去了武汉,一直住到6月26日方才离开武汉〔3〕。之后,毛泽东去过湖南〔4〕,7月间还到过浙江〔5〕,国庆节之前回到北京〔6〕。在这段时间,林彪曾经去过一次井冈山〔7〕。之后,返回北京,与毛在京共度国庆。林返京时是否路过苏州并逗留?待考。

“十一”过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人扬言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出于战备需要,1969年10月15日毛泽东乘火车再次去武汉〔8〕。10月16日,林彪去了苏州〔9〕。毛林离京后,周恩来和在京政治局人员和军委办事组人员撤往西山。

1970年3月间,毛泽东是住在武汉,并派汪东兴回京传达他有关召开四届人大的指示。

林彪自1969年10月离京后,一直在苏州居住。

1970年4月25日,如邱会作所说,毛泽东路过苏州,和林彪见面。

“毛林苏州会面”后,毛泽东和林彪几乎同时回到京〔10〕。

那么,从1969年4月24日中共“九大”闭幕到1970年4月25日这整整一年的时间内,曾经有过几次“毛林苏州会面”呢?此事有考证之必要。

高文谦先生说,苏州“毛向林荐张”之事发生在“‘九大’之后”。

按照用语习惯,所谓“‘九大’之后”不应该理解为距“九大”闭幕相隔很长的时间。邱会

作所说的“毛林苏州相会”发生在1970年4月25日，其距“九大”闭幕已整整一年，谓之“‘九大’之后”似乎不合常人的用语习惯。按照常规理解，高文谦先生所说苏州“毛向林荐张”之事应该发生在“九大”闭幕到10月15日战备疏散这段时间内。

笔者另有一推测——或许高文谦先生和邱会作所说的“毛林苏州会面”实际上是同一次？！只不过邱会作在叙述史实时隐去了毛泽东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的重要情节。其推断理由如下：

首先，从谈话内容的相似性分析：

高文谦先生版的“毛林苏州会面”中，是林彪提出，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人，目的是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林彪夸奖黄、吴、李、邱的原因很清楚，林彪是在变相否决毛提张春桥做接班人的提议。

而在邱会作版本的“毛林苏州会面”中，是毛泽东主动夸奖了黄、吴、李、邱这些“红小鬼”。但毛为何夸奖黄、吴、李、邱？邱会作没有说清楚。

总之，毛林在谈话中确实涉及黄、吴、李、邱从小跟着毛泽东干革命和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这些内容

其次，从当时的政治背景分析：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派汪东兴回北京，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自己关于着手召开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的指示。毛指示中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修改宪法时不设国家主席〔11〕。到会政治局委员“一致拥护毛泽东意见，商定立即着手进行以下工作：（一）成立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工作，并约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面商；（二）成立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修改宪法工作，先将修改要点写出，至四月八日完成修改工作；（三）由周恩来、姚文元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稿，集中讲当前政策和计划问题等”〔12〕。有学者指出——在这三个与筹备四届人大有关的“工作小组”中，唯有张春桥一人的名字同时出现在两个小组的名单中，其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显而易见〔13〕。

但是，4月11日，林彪在苏州经过再三斟酌后，针对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提出了相反的意见，绕过新宪法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个关键问题，直接建议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14〕。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转达林彪的意见后，到会政治局委员又一致拥护成林彪的建议。但江青在会上说了一句内涵很深的话：“毛主席还在，林彪如当国家主席，也不好”〔15〕。毛泽东为避免夜长梦多，在林彪表态后的第二天，立即表态：“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16〕。

由于林彪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公然对抗毛泽东，所以毛泽东在回北京之前的4月25日亲赴苏州面会林彪，并发生了“毛向林荐张”之事。毛泽东此举就是要明确传达要林彪“歇菜”的信息。

“毛向林荐张”之事可能不像高文谦所说，发生在“‘九大’之后”，而是发生在“九大”闭幕整整一年后的1970年4月25日。有两个人文字似乎可以旁证这一点：

关于文革中的“毛林苏州会面”，除了高文谦先生的书和邱会的回忆录中有所记载之外，舒云女士在她的被王年一先生称为“全景式的大曝光”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一书中也有

过两段与“毛林苏州会面”相关的文字。

第一段文字是这样说的：“张云生回忆：毛泽东带张春桥等人去苏州前，批评张春桥：林彪在苏州，你们怎么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张春桥说，人家保密”〔17〕。

第二段文字是这样说的：“4月25日，毛泽东坐专列从上海到苏州去看望林彪。……毛林会见的气氛很好，有说有笑。……那是东方红卫星刚上天……官伟勋（林办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问林彪怎样才能防止出现修正主义时，林彪回答：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18〕。

舒云女士的这两段文字说明，“毛林苏州会面”时，张春桥确实是在场的。但是，“毛向林荐张”之事，舒云女士在上述两段文字中均未提及。看来“完整调查”还是不够完整。

师东兵先生在《汪东兴传》书中曾提到一个与“毛向林荐张”史实很接近的一个情节：

……直到一九七零年就要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他（指林彪）听到张春桥将要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传言后，询问汪东兴毛泽东和什么人来往比较多？汪东兴说，张春桥在毛泽东面前说林彪没有理论功底，作为接班人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江青是想让张春桥来做林彪的助手。一旦林彪身体不好时，张春桥好出面取而代之。……

但是，师东兵先生的《汪东兴传》全书无注释。读者无从知晓其史料出处。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决定弃用林彪的，已经是一个无法考证的事情。但是，1970年4月25日毛泽东当着林彪的面要让张春桥接班之事和1970年3月正在启动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密切相关；和1970年4月间毛林之间就“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发生争执密切相关；和1970年7月张春桥和吴法宪之间关于“八一建军节社论”中是否允许毛泽东和林彪一道“直接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发生的争论密切相关；和1970年8月14日张春桥吴法宪之间关于“宪法修改草案”中“三个副词”发生的争论密切相关；和在1970年8月23日林彪率众在刚刚开幕的庐山会议上向张春桥发难密切相关；和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动“批陈整风”运动回击林彪“清君侧”之举密切相关；和1971年9月13日林彪夺机外逃—殒命黄沙密切相关。避谈“毛向林荐张”这段史实就无法圆说发生“林彪事件”的因由和结果。

三、毛泽东真的想让张春桥做接班人吗？

毛泽东真的是想把接班人的位置传给张春桥吗？

文革期间，张春桥在毛泽东的权利布局中始终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但是，毛泽东是不会把最高权力交给张春桥的。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从后来召开的中共十大对中央副主席的安排——四届人大的政府总理人选安排——周恩来死后的总理人选安排——以及毛泽东死前对党的第一副主席的安排，张春桥都不在圈定人选的范围之内。

毛泽东对进入中央决策层的人员的档案是一清二楚的。刘少奇的所谓“叛徒内奸”案看似结案于1968年。实际上早在建国初，毛泽东已经通过高岗掌握了刘少奇早年在东北被捕和关押的原始档案〔19〕。张春桥和老婆文静的变节问题在文革中曾被上海造反派搞得风生水起，继而又风平浪静本身就很可疑〔20〕。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庇护张春桥是为了文革之大计是不必争论的问题。

毛泽东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的用意很清楚，只是要向林彪传达一个信息：你的接班人位置不是不可以变更的。让张春桥接林彪的班只是一个由头，不拿张春桥做由头，换成陈永贵，吴桂贤也未尝不可。

林彪做接班人的事情不是已经写进党章了吗？写进了党章的事儿还能够随便更改吗？如果可以随意更改岂不成了儿戏——这几乎是林彪拥趸为林彪喊冤的文章都持有，但又不敢明说的一个观点。

儿戏党章！这正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在一百多年的国际国运的历史上，法定某人可以继承尚未死亡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的权力是一件绝无仅有的事情。即使是北朝鲜这种封建世袭的国度，在其执政党——劳动党的党章中也没有法定某人可以继承尚未死亡的在位领袖的统治权力的文字。作为亲儿子，金正日也罢、金正恩也罢，都只是在亲爸爸金日成和金正日死后，才敢修改党章，把自己的名字写入党章。

笔者在少年时曾读《赫鲁晓夫主义》一书。当读到列宁遗嘱那段文字时，感觉很异样——他快死了，凭什么还要说三道四？当“九大”党章把林彪的“接班人”的地位煞有介事地写入党章时，少年笔者的感觉就更加异样：林彪的“接班人”名分难道不是相对毛泽东的死亡才有意义吗？“九大”党章被举手通过的那一时刻起，林彪在这个世界上存活的全部意义就是等待毛泽东的死亡——人怎么可以这样恶毒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依然可以安然无恙呢？

当然，对党章确定“接班人”之事毛泽东或许有另外的理解。

当“九大”新党章儿戏般地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的时候，无产阶级先锋队章程的严肃性就已经被践踏了。它已让位于一种毫无严肃性可言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实际上体现的是另外一种的游戏规则。从林彪在“九大”的党章中被法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那个时刻起，新的游戏规则就悄然有效了。既然可把封建储君式的人选堂而皇之地写进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章这等儿戏之事可以发生在前，为什么不可以有君王任意废黜储君的举动发生在后呢？对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废黜暂且不提。林彪死后，毛泽东对王洪文也是先立后废，并用王洪文类比刘盆子。刘盆子就刘盆子！王洪文一如既往，该吃吃，该喝喝；至于副主席的位置的随意更换也不是不可以的——李德生在副主席的位置上只坐了16个月，就被毛泽东强迫辞职，黑不提白不提了。王洪文李德生对此虚位都看得很开。唯独林彪同志居然为“接班人”之虚名闹将起来。

“毛向林荐张”所释放出来信息就是两个字：歇菜！以林彪之敏感不可能听不懂。林彪在接受到毛让他歇菜的信息后，其心情肯定是极其复杂的。首先占据其大脑统治地位的感觉应该是羞辱。林彪曾经对他的喽罗们说过：“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小记者”（21）。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记者居然要和自己平起平坐甚至骑到自己的脖子上去了。感到羞辱之后，愤怒就接踵而来。毛泽东推荐张春桥接班本来就是一个由头，激怒林彪才是目的，可林彪还真的生气了，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呼风唤雨，着实闹出些大动静来。

四、林彪拥趸的定义

“毛向林荐张”之事基本讨论完毕。“毛林苏州相会”的确切时间留待继续考证。下面的文字用于与林彪拥趸之商榷。

既然是如副标题所说，要就林彪事件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与林彪拥趸进行商榷，就应首先为“林彪拥趸”这个概念做个定义。

何谓拥趸？

“拥”字好懂。拥护，簇拥之意。

“趸”字较为费解。百度百科上的解释是：“趸”是一万只脚，表示众多，引申为聚集；“趸”字还有“唯万是足”之意，达不到“万”就是不足，可引申为“囤聚、聚集”。

现在将“拥”“趸”二字连接，“拥趸”之意了然：拥趸就是“为了拥护某人而聚集，且形成簇拥之势的人群和个人”。这样的人群和个人有什么特点呢？百度百科给出了提示，即：“拥趸非常注重的是忠实”。什么是“忠实”？“忠实”就是没有原则地爱屋及乌或恨屋及乌。

那么“拥趸”的准确定义就应该是：“为了忠实地拥护某人而聚集，且形成簇拥之势的人群和个人”。比如林彪就曾经是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一个拥趸。“拥趸”一词可以单数、复数兼而用之。

“拥趸”之意已经明了，那么“林彪拥趸”的定义也就不难搞定。“为了忠实地拥护林彪而聚集，且形成簇拥之势的人群和个人”就是“林彪拥趸”。

林彪拥趸的成因不详，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这个人群或个人所共有的奇异思维很值得探讨。

林彪拥趸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曾经与林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死党”级人物的经历不一样，但是，却可以莫名其妙地将他们之好恶无条件地转化为自己的好恶。林彪拥趸在“林彪事件”研究领域中所占的人数比例数并不是很大，但是人们都知道这类拥趸拥林的方式和手段都很了得。

为了让读者对林彪拥趸有一个较深刻的认识，下面举出一人两例：

王年一先生生前曾著有一文，题为《向所有横直育Ⅶ的人致敬》，堪称“林彪拥趸”宣言书。文中说林彪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子”，且具有一种“爱国家、爱人民的伟大人格”——拥趸之态跃然纸面。

王年一先生在《林彪不惜一死粉碎文革》一文中还有更惊悚的话语：“以一死而拯救万民，林彪堪称伟大”、“万世骂名不足惧，但求苍生得太平。古往今来，林（彪）是中华第一大英雄”。

但是，在当年八亿中国人当中，到底是哪一个人因林彪的死而被拯救了呢？王年一先生至死都没有予以说明。大家只是知道林彪死后，不但没有人被拯救，而是有很多人因之被牵连、被审查、被监禁。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因林彪的失势和死亡而被拯救的人的话，那么这个人只能是张春桥了。而“苍生之太平”更是乌有之事。至于林彪是“第一大英雄”之说只能用于证明王年一先生无愧于“林彪拥趸”的领军人物而已。

五、林彪拥趸为什么避谈“毛向林荐张”这段史实

“林彪拥趸”的定义已经作出。现在讨论本文的最后一个问题：林彪拥趸为什么要避谈毛泽东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这段史实的呢？

以林彪、叶群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判断，“毛向林荐张”这一关乎林彪政治生命走向的重大动向，林、叶不可能不向黄、吴、李、邱透露。黄、吴、李、邱的后代在一些非正式场合多次谈到过苏州“毛向林荐张”这段史实。后代们的信息来源于父辈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奇怪的是，在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三人在“九一三事件”三十年后所写的回忆录中，却不约而同地都缺失了这段重要的史实。每个人由于自己的立场、情感倾向，在写个人回忆录时对史料的选用是有选择的。而经过选择性描述的历史是和真实的历史是有距离的。人们常说，个人回忆录的不可靠性，或不完全可靠性，或完全不可靠性可由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回忆录同时缺失“毛向林荐张”这段史实被再一次证明。

不只是吴、李、邱在各自的回忆录中有意回避了“毛向林荐张”这一几乎可以准确揭示庐山会议上“毛林争斗”实质的重要史实，林彪拥趸们在为林彪辩诬的许多重头的综述性文章中也均不提及“毛向林荐张”之事。例如：王年一的《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林彪不惜一死粉碎文革》、《1970年的庐山会议及毛泽东、林彪冲突之起源》，丁凯文的《林彪事件研究的再思考——与高华商榷》、《论1970年庐山会议及其影响》、《再论1970年庐山会议及其影响》、《庐山会议的斗争与毛泽东处理林案》、《论汪东兴与林彪事件之关系（一）、（二）》、《也谈林彪913事件——评肖思科〈粉碎五大谣言——知情人证明林彪真正死因〉》等等。按照林彪拥趸的逻辑，在“林彪事件”中，林彪是被毛泽东欺负和逼迫的一方，那么“毛向林荐张”事属毛泽东第一次欺负林彪，且打上门去，林彪拥趸本应对其大肆宣扬、大做文章才对啊。但是，奇怪得很，事情却恰恰相反。

文章所述各有侧重，史料引用难免周全——这也许是林彪拥趸在文章中缺失“毛向林荐张”这段史实的一个较为充分的借口。但是，在丁凯文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一书中，署名“渔歌子”编辑的《林彪“文化大革命”大事记》（22）中，连林彪抽叶群大嘴巴的家事都记录了进去，却偏偏缺失了苏州“毛向林荐张”这段重要史实。

多年以前，笔者在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书中看到毛泽东在苏州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这段史实时，首先要做的就是看一下注释，看看这段史料的出自何处。但是笔者惊异地发现，“毛向林荐张”的这段史实最早竟然是出自王年一先生的著作《大动乱的年代》中！高文谦先生在《晚年周恩来》一书提及此事时，还专门在注释中写明，这段史实引自王年一先生的1988年版的《大动乱的年代》的第388页。

于是，笔者再翻阅王年一先生1988年版的《大动乱的年代》，想看一看王年一是如何注释这段史料出处的？但是，很遗憾，一向严谨的王年一先生在书中对此段史实的出处没有给出注释。多亏高文谦先生除了注明这段史料来自王年一先生的《大动乱的年代》之外，还加注了一段文字，说明毛泽东在苏州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这段史实还出自“胡乔木在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的讲话”。以胡乔木在中共党内具有的身份和其谈话的场合来看，苏州“毛向林荐张”这段史实的真实性是不必怀疑了。

以笔者之寡闻，《大动乱的年代》一书1988年出版后，至今已二十五年。这期间似乎没有人出来质疑过毛泽东在苏州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这段史实的真实性，尽管它很少被提及。至少王年一先生本人在有生之年也没有出来申明予以更正过。而且林彪事件研究的专家中不乏考证派学者，好像也没有人对这段史实提出过异议。

毛泽东在苏州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这段史实的出处基本说清楚了。王年一先生避谈苏州“毛向林荐张”这段史实的原因也就随之清楚了：《大动乱的年代》一书的出版时间是1988

年。那时的王年一先生还没有专门涉足林彪事件研究这个领域，尤其是还没有沦落成为一名林彪拥趸。所以他当时尚能够如实地呈现他手中所掌握的史料。但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当王年一先生开始专门研究林彪事件之后，尤其是王年一先生变身为一个地地道道、货真价实的林彪拥趸之后，他就不再在他本人以及他和合作者的文章中提及苏州“毛向林荐张”这段史实了。不仅是王年一先生，其他林彪拥趸也效仿王年一先生的做法，均在为林彪辩诬的文章中，避谈苏州“毛向林荐张”这段史实。此等默契几乎成为一种共识。

林彪拥趸为什么那么忌讳谈及毛泽东在苏州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这段史实呢？

苏州“毛向林荐张”这件事和林彪几个月（或十几个月）后率众在庐山会议上向张春桥发难之事之间的必然联系是如此之显而易见。提及“毛向林荐张”的史实对于揭示庐山会议真相——“林彪发难张春桥”之动机有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林彪拥趸们想把林彪正义化和正确化，想把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林彪发难张春桥”的闹剧描写成一个反文革之壮举。因此，苏州“毛向林荐张”这段史实必须予以回避。因为如若提及这段史实，林彪拥趸即使使出全身解数也难以圆说庐山会议上“林彪发难张春桥”之因由了。

林立果在他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对“毛向林荐张”和“林彪发难张春桥”这两件互为因果的事件做过的坦诚的描述：“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而相应的对策之一是“先斩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实，逼迫B-52就范”（23）。林彪拥趸高度评价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说此纪要是“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批判乃中国思想解放的先驱”（24）。既然如此，林彪拥趸为什么不在“毛向林荐张”和“林彪发难张春桥”的史实陈述问题上，效仿一下林立果的坦诚和直白呢？

在即将结束本文的时候，还应说明一点，毛泽东在苏州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这段史实在所有官方出版的文字中也同样是缺失的。比如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汪东兴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吴德的《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等等。其他林彪问题研究人员的文章，如于南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一场风波》也未提及苏州“毛向林荐张”这段史实。张春桥死后，笔者见到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先生在《张春桥之死》（25）的文章，其中很晦涩的提到过苏州“毛向林荐张”这段史实。

官方文字不提及毛泽东在苏州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这段史实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一旦提及苏州“毛向林荐张”这段史实，毛泽东的形象将受到损害，且诸多对林彪的指控也都将无法自圆其说，例如“天才论”、“设国家主席”这些虚拟罪责。

但是，一向在林彪问题上和官方大唱反调的林彪拥趸们为什么也不愿提及苏州“毛向林荐张”这段史实呢？这种巧合难道不正好说明林彪拥趸在同一个重大的问题的认知上和官方具有同种的忌讳和不诚实吗？

结束语

“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42年。林彪拥趸总想把“九一三事件”描绘成一出悲壮剧。但是“九一三事件”的悲剧色彩实在很淡，壮剧色彩地没有。记得当年北京一蹬三轮的老爷子在街道办事处听完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外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文件后，甩出一句京片子：“这算怎么档子事儿啊，这都哪儿跟哪儿啊？”——真是一语中的。

“九一三事件”唯一的一点历史性提示就是让老百姓用看戏的方式明了了，原来被林彪鼓噪的可以类比欧洲文艺复兴（26）的毛之千秋大业——文化大革命革——不过是一场闹剧，“九

“一三事件”就是这场闹剧的高潮，而已，而已。

终稿于 2013 年 7 月 20 日 北京西山植物园

注释：

- (1)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 276 页。
- (2) 《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 151 页。
- (3) 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558 页。
- (4) 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561 页，注释 2.毛泽东同黎原、华国锋谈话记录，1969 年 6 月 28 日。
- (5) 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561 页，注释 3.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谈话记录，1969 年 7 月 8 日。
- (6) 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562 页。
- (7)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第 361 页。
- (8) 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563 页。
- (9) 《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 766 页。
- (10) 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567 页。
- (11)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 281 页，注释 43《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 年 18-25 日。
- (12)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353 页。
- (13) 余汝信《1970 年宪法修改草案解读》。
- (14)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 282 页，注释 45 林彪口授给毛泽东的电话记录，1970 年 4 月 11 日。
- (15)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 282 页，注释 46 陈晓农编著《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
- (16)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 292 页。
- (17) 舒云女士《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上册》，第 142 页。
- (18) 舒云女士《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上册》，第 192 页。
- (19) 杨继绳《高岗秘书谈“高岗事件”》，《炎黄春秋》2013 年第 6 期。
- (20)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第 184 页。
- (21) 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558 页。〔
- (22) 丁凯文《重审林彪罪案》第 871 页-1007 页。
- (23)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 309-311 页。
- (24) 丁凯文《重评五七一工程纪要》。
- (25) 王海光《张春桥之死》，刊于《学习时报》2005 年 6 月 9 日。
- (26)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话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与欧洲文艺复兴做类比。

□ 原载《北京之春》2013 年 8 月号

~~~~~

# 【亲历者说】

我所经历的“六一八”事件始末

• 马洪路 •

北京大学的文化革命，必须有“六一八事件”这一篇章。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绕不开这个影响巨大而深远的历史事件。

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称北大“社教”运动后期召开的国际饭店会议“是1965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这个“定性”结论在北大又投下一颗炸弹，令北大师生员工感到瞠目结舌。社论一发表，北大内部就围绕这一历史旧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聂元梓一派开始对曾在国际饭店会议上不赞成他们观点的人进行肆无忌惮的打击报复。谁敢做“保皇派”呢？那是已经定性的“资产阶级”，于是大家争先恐后地做起“革命派”来。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造反派”是无上光荣的左派桂冠，而“保皇派”则是右派的代名词。划分是左派还是右派，是以反对以陆平为首的党委为界限的。

6月6日，康生到北大看大字报，赞扬北大的革命形势。6月7日晚，历史系部分同学去清华，揭露蒋南翔在我们历史系“半工半读”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还没有转过弯来的清华党委组织“辩论会”，围攻北大同学，并驱逐出校。

在腥风血雨袭来时，6月10日，历史系教授汪篪不堪忍受侮辱在家中自杀，年仅50岁。汪篪曾是学术泰斗陈寅恪的学生，追随陈多年，并担任过陈的助手，与季羨林、周一良等私谊甚笃。1953年，汪教授奉郭沫若之命，前往广州劝说陈寅恪北上担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被陈拒绝。后来，汪调北大历史系任教。60年代初，汪篪已经在治隋唐史方面成绩斐然，颇有名气，被称为“党内专家”。1963年经教育部批准，汪篪晋升为北大历史系教授，给我们讲过课。可是，“文革”刚刚开始没几天，这位富有才华的历史学界的新星便陨落了，成了疯狂年代政治祭坛上的第一批祭品。这件事对学校的许多老教授震动极大。

汪篪自杀后，北大教师中连续发生多起自杀事件。

6月16日，技术物理系同学揪斗了总支书记石幼珊，为全校树立了“批斗”的榜样。紧接着，各系揪斗“黑帮分子”的行动如火如荼，成为“六一八事件”的先声。

指导激烈的大学生们开展批斗的纲领，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既然可以给反动派戴高帽子游街，而且“好得很”，既然土豪劣绅太太小姐的牙床上都可以滚一滚，还有什么不可以？

6月18日，各系集中在38楼下的“斗鬼台”批斗。大约揪斗了50多人，这就是有名的“六一八事件”。

说起文化大革命，没有人不会想到北大。说起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人不会想到武斗。但是，说起武斗，人们却只想到那一阵阵鬼哭狼嚎，很少有人去探讨根源。一些“研究者”轻松地把灾难往“红卫兵”和他们的“红司令”身上一推了之。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在北大，武斗的起源也在北大，追根溯源，就是北大运动初期的“6·18事件”那一场悲剧，以及一个多月后在北大东操场上演的在“中央”面前的打人丑剧。最终导致聂元梓利令智昏，指使签署“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哲学系高云鹏赤膊上阵，悍然策划了1968年3月29日血洗燕园的大规模武斗。

对“6·18”这个或“革命事件”或“反革命事件”大辩论的结局，最终由“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亲自三次到燕园推翻了“工作组”宣布的“反革命事件”的结论，郑重宣布是“革命的”性质而结束。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由此所带来的历史劫难，就是逐渐推广到全国各地的各种规模残酷游街示众和逐渐升级的武斗。当年八月之后我们到各地串联，几乎

每到一地，学生们都纷纷提问：“如何理解北大这个事件？”得到的都是中央文革所明确的“革命事件”的肯定回答。尽管后来上面发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命令，失去理智的人们已经不再理会了。

目前，对这一事件的反思虽然还属于“禁区”，但 40 多年后的思考，却应该为了忘却其血腥和暴戾而有所纪念，目的是希望那种伤亡的惨痛不会在今后的历史上重演。

1966 年 6 月 18 日，北京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初夏的清晨，动荡了 20 多天的北京大学校园已经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派来的工作组领导下逐渐恢复了平静。早饭后，我所住的 38 楼东侧突然聚集了一些人，我闻声下楼看时，有人在东房山墙外高高的水泥阶梯壁上贴上了“斗鬼台”三个大幅字，很快就有一批学生押着几个老师到这里进行批斗了。紧接着，各个系的学生一拨跟着一拨，不断押着老师到这个“斗鬼台”前接受批斗。

我和许多同学一样，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事件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也全然不知该怎么办。按照当时的形势，既不敢也没有制止的念头，又不愿参与，所以只能远远地在人群后面看着。虽然我也自诩为运动的“造反派”，甚至是造反派里的积极分子，但是我的斗争矛头是对着“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而且心中坚守不打不骂的道德底线。对于把如此之多的教授包括中青年教师统统抓过来批斗，心里犯着嘀咕，所以我只好观望。

历史系 62 级同学马生祥对这个日子有比较清楚的回忆：

“6 月 18 日早饭后，我们 62 级在 38 斋分班学习批判。62 级当时分成了 3 个班，考古班（1963 年分出）、中国史班和世界史班（1964 年分出）。与往常不同的是没有工作组成员参加。10 点多一点，中国史班开始乱起来，有人把许保福和王彩霞推搡着往楼下走，我和其他人跑下去看。

38 斋东门有一个拐角，门前有一个平台，可容纳几十人。东门前有一片开阔地，可容纳数千人聚会。我看到，在平台上被批斗的人中有历史系的前团总支部书记、留苏预备人员范达人，现团支书记赵德教，前任团总支书记张元杰，辅导员贾梅先；学生干部有 61 级党支部书记尹振玲（人称“尹大姐”）、杨绍明（杨尚昆的次子）、王彩霞、许保福等 20 多人，其余的是哲学系的师生。我认识一人，那就是从中央警卫团 8341 部队保送到北大哲学系、时任哲学系 64 级党支部书记的张晓恒。他们个个头戴纸糊的高帽子，有的来不及糊高帽子，就从厕所中找一个字纸篓子，戴在头上充高帽子。字纸篓是铁丝编织而成的，往头上戴时，有人被划破了脸，鲜血直淌；还有不少人脸被涂了黑墨汁，惨不忍睹。批判斗争某人时，令其低头、下跪，若不服从便遭毒打。他们挂的纸牌上分别写着“修正主义苗子”、“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黑干将”、“黑帮”、“保皇派”等等。批判斗争达两三个小时，后被工作组闻讯赶来制止。……”

在批斗不断加温升级了，各系的一些“牛鬼蛇神”不但纷纷被押解到这里被野蛮批斗，而且戴上高帽在校园里游街示众，被殴打唾骂。当我看到历史系 4 年级的学生党支部书记、女同学王彩霞也被拉到台上，并有人撕扯她的衣服时，我真的气愤起来。于是我找到同班同学崔学谕（后任首都博物馆常务副馆长）、王璧（后任深圳博物馆馆长）等一起商量了一下，他们也对这种混乱和对人格的侮辱十分不满。我们一起回到四楼的宿舍里，打算表示一下看法。情急之中，我急忙查找到了两条毛主席语录，由毛笔字写得很漂亮的崔学谕执笔，在我们的宿舍 420 房间写出了两条大标语，记得是用许多张黄色大字报纸粘连在一起的，一条写的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另一条大意是：按照工作组的指示，搞好文化大革命。写好之后，我探出头从楼道的窗口悬挂张贴出去，正悬在“斗鬼台”的上方。

我们的用意是很明显的，就是给这种混乱稍微“降温”。但是这个举动激怒了头脑已经发涨的人们，一些同学冲上楼，闯进我们宿舍兴师问罪。因为大家看到是我贴出去的，记得其中一个当时三年级的同学李某某抓住我的衣领举拳要打我，正危急时，和他曾经同班、十分相识的王璧忙过来解释说我们都是造反派，并不反对批斗“牛鬼蛇神”，总算解了围。我的脑海里至今不能忘却自己在这个“事件”中险些挨揍的惊人一幕。

根据1967年4月19日至21日清华大学王良生等到北大的调查，并经当时的“新北大公社总部办公室”、“校文革办公室干部问题联络站”和西语系、东语系、法律系、经济系等8个系的走访核实，了解到6月18日当天被揪斗的共计56人，其中被打成“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的32人，“反动学生”2人，其他“反动分子”14人，当时就确定“斗错”的8人。在被批斗的人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0多人，包括校党委宣传部长谢道渊、组织部长张学书、几名党委常委和各系的党总支书记等。在全校18个系中，有16个系参与了揪斗，只有物理系和地球物理系没有人在这一天被揪斗。被聂元梓点名的陆平和彭佩云因为每天都被批斗，成为“死狗”，这一天躲过了浩劫。

当晚，从外面开会回来的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听取了汇报后，十分生气，当即在学校广播台上发表了讲话，指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上午的“事件”是“有目的、有步骤、有组织、有计划的”事件。一时间，学校的舆论大乱。

第二天上午开始，工作组布置全校师生在各自房间里闭门讨论“6·18事件”。从此，学校的5个校门都紧紧关闭，加强了门岗守卫，纠察队也开始夜间巡逻。张承先以为这样就建立起了“无产阶级新秩序”。

在张承先下令封锁校门的6月19日，心中忐忑不安的王光美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了解运动情况。薄一波也几乎同时到了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并对工作组给予了支持。

6月20日，张承先写了《六一八简报》和《二十天工作总结》在北京市委工作组干部会议上做了介绍。张承先工作组的“简报”称：

“……通过以上措施，绝大多数群众热烈拥护工作组的主张，纷纷揭露并谴责了坏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如工人张鼎如说：“工作组支持我们革命派，领导我们革命。但是有一小撮坏蛋却企图给工作组抹黑，把运动搞乱。我们决不答应，一定要把它顶回去。要和工作组一起，把这次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好。”化学系二年级许多学生，在讨论中揭发了几个假左派的活动情况。有些同学说：“坏人企图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水搅浑，转移斗争目标。我们今天就是混战了一场，上了坏人的当。”许多系的广大师生在会上就高呼口号：“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中央的话”，“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把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新市委负责人李雪峰当场表扬了张承先，并指出“这样的反击要多来几次。”于是，北京市各个院校的工作组学习北大的经验，一律封锁校门，严格限制出入，运动的混乱局面一时得到了控制。不久，李雪峰即为此而付出了丢掉乌纱帽的代价。

1966年6月20日，张承先工作组的第九号《简报》，被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迅即转发给各地党委，遂成为各省市“镇压革命”的尚方宝剑。

中共中央文件内容是：“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

法处理。”

事情的发展是完全出于张承先工作组的意料的。他们不知道“亲自发动和领导”运动的伟大领袖正在冷眼观察和谋划着再次出手。就在20日这天，北京地质学院有人贴出大字报，反对以邹家尤为首的工作组，成为该院的“6·20事件”；北京轻工业学院的学生批评工作组，薄一波亲自到该校调解，撤换了原来的组长，重新派两个副部级领导到轻工业学院主持工作；北京师范大学也有一些学生贴出大字报批评工作组：《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处？》；不明真相的孙友渔学习张承先的经验，立刻发表广播讲话，严厉地批评了这些学生；晚上，新市委指示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要“信任工作组，支持工作组，帮助工作组。”一直到半夜12点，北京铁道学院一些学生还在强烈要求撤换工作组，薄一波和吕正操又急急忙忙地发出指示对工作组进行安抚。

事情都赶在同一天，背后有什么玄机呢？

几天之内，北京市有39所大学出现驱赶工作组的情况。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在被“忽悠”的懵懂中则对张承先的汇报很满意，他们指示发出的中央文件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而康生之流却暗中想好了另一套策略。

刘少奇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和伟大领袖的深谋远虑了。

毛泽东当时一心想着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而刘少奇和邓小平等领导的中央则一心想着如何熄灭这场烧向自己的大火。

毛泽东回到北京，否定了“中央”关于“六一八事件”的说法。

1966年8月5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认为批发这个简报是错误的，决定撤销这个文件。同一天，毛泽东主席毅然决然地在中南海里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一场大戏在6月1日开台的紧锣密鼓之后，终于正式开场了。

□ 原载《燕园风云录——北大文革回忆资料汇编》

~~~~~

【心灵创伤】

寻找“文革”隐伤者——研究“文革”遗伤的心理学者

• 范承刚、何谦、苏桐、廖梅、周楠、潘梦琪 •

如同控制录影机，顺放或倒带，一名心理治疗师正在让一名中年男性回溯自己的一生，寻找那个影响他最深、最重大的事件。治疗师称其为“节点”。

记忆的门逐渐打开。这名男子首先想到自己10岁时，被父亲用皮带痛打的情景。描述这一记忆时，他全身抖动，流下眼泪。

当治疗师问，是否还有其他画面可以回放？男子将想象退回到5岁，突然，他出现了姿势

的改变，声音变得极为幼稚，失控地用手捂住眼睛，不连贯地喊着“怕、怕”的字眼。当问他眼前是什么，他说看到“文革”时，红卫兵冲进他的家，将一向是权威的父亲拉到院子里，勒令其跪下，用铜头皮带死命抽打的场景……

上述案例，是心理学家施琪嘉在 2010 年众多访谈中的普通一例。十余年来，这位武汉市心理卫生研究所的所长，一直致力于解答这样的问题：已结束近四十年的“文革”仍如何隐形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内心与生活？

他的工作可以用孤独来形容：一直处于地下状态，难以发表论文，也极少公开讨论，研究者更是寥寥可数，“十个手指头就可以数过来”。

这群中国研究者得到的唯一支持，来自德国。自 1980 年代后期德国学者将精神分析理论引入中国临床心理治疗后，出于由“柏林墙”记忆中艰难痊愈的同理之心，研究一直得到这群异乡人的帮助。

中德两国学者尝试着将精神分析理论引入对“文革”的观察，持续近二十年的研究发现：“文革”的心理创伤不仅持续地影响着亲历者，还对其子女乃至后世数代人产生了代际传递。

尤其值得重视也长久被忽视的是年轻一代的问题——他们承担了父母在“文革”中未加处理的创伤，被父辈施加的精神重担无声改变着。

这种影响后代精神活动的心理机制，被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主席阿夫·葛拉赫（Alf Gerlach）称为“跨代际授权”，最明显的后果是损伤后代的思考及记忆能力，“孩子陷在父辈的经历中，重复着其经历的创伤。”

这也是施琪嘉及其同伴一直试图治愈的伤痕，“‘文革’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创伤，它至今仍在生疼、化脓。这段记忆需要获得治疗性的处理。”

◇ 弗洛伊德：从“柏林墙”到“文革”

“德国关于二战及”柏林墙“时期的幸存者及其后代的大量研究，让我们有一定经验对于‘文革’时期的这段历史进行类似观察。” 安姬·哈格说。

心理咨询师陆晓娅从未想到，于她而言，“文革”从未远去。

伤痛的再度来临是在 2007 年，这位出生于 1952 年的老人参加了一个由香港治疗师组织的心理工作坊。这是她作为心理咨询师的一次例行培训，工作坊上，每个人都需要说出自己的故事，以完成自我体验。

无意中，有人提到“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父亲自杀对自己的困扰。出乎意料地，悲伤和愤怒一瞬间在房间里弥漫，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

培训者大都与陆晓娅同龄，均是“文革”的亲历者。香港的老师感到吃惊，他很难理解这群老人到底经历了什么。他决定邀请所有人说出自己的故事。

站出来的都是受害者：目睹自杀、被抄家、作为“狗崽子”受尽羞辱……经历了一夜的失眠与胃痛后，陆晓娅也说出内心的痛苦：“文革”中，她曾用军用皮带，抽打过自己的老师……

曾经一度，陆晓娅将这段记忆封存，很少再回忆；作为《中国青年报》为青少年提供心理咨询帮助的“青春热线”的创办者，她也自认为完成了心理上的治疗与痊愈。

残酷的回忆却如此轻易的方式刺入心头，这让陆晓娅意识到：“文革”是一件“未完成的事”，表面愈合的心灵伤口，其实一直在化脓。

陆晓娅尝试做更理性的思考：她开始观察自己，乃至经历过众多政治运动的母亲，借此分析“文革”创伤所带来情绪与行为问题：反应过激、焦虑抑郁、缺乏人际信任……

远在千里之外的武汉，施琪嘉也早在进行类似研究。自1996年由神经内科医生转向心理治疗后，施琪嘉一直尝试着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文革”心理创伤及其代际传递。

神经科学的理论基础帮助了他，大量研究后他发现：创伤记忆，带着强烈的负性情感片段，会储留、堵滞在杏仁核内（右侧脑岛），不能正常上传到负责记忆整合的海马，并进一步处理到皮质，因此，它会如一个深藏在体内的发炎脓肿一样，不断地影响着机体。

“这是大多数‘文革’亲历者未曾意识却始终承担着的梦魇。”施琪嘉说，“痛苦的回忆会反复以各种形式——画面、声音、味道、皮肤感觉的闪回，一直存在于受害者的头脑中。”

施琪嘉的研究，受益于他的老师——德国精神分析学家安姬·哈格（Antje Haag）。

1988年，安姬·哈格首次前往中国授课。她发现自己的“学员”里，一部分年纪较大，都是50岁上下的男性，是在“文革”中被禁止从业的精神病科医生；另一部分年轻学员，则都不满30岁。

明显的年龄层空白——“文革”时许多大学都被迫关闭。学员们随后表现出的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强烈兴趣，更让这名德国人深感触动。

这群学员急切地想要学以致用，治愈时代的病患——1982年，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主席玛格丽特·哈斯·维瑟加尔特（Margarete Haa Wiesegart）参观在北京、成都及上海的精神病院后发现：住院患者多被诊断为重性精神病，其妄想和幻觉都来自政治运动的影响。

1996年，原《工人日报》记者吴琰也曾以“世纪之患”为题采访北京多家精神病院。她发现医院里大量的精神病患者仍沉浸在红色岁月，一些患者甚至出现了病理性象征性思维：会彻夜抱着暖气管睡觉，因为构成暖气管的钢铁代表着“工人阶级。”

1997年，“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正式运作，在德方的帮助下，精神分析理论也被引入对“文革”心理创伤的研究中。

1999年，曾在德国做过辛提人和罗姆人（纳粹时期欧洲被害族群）创伤研究的安姬·哈格，联合6位中国学员，开始了对于“文革”心理创伤的研究。

“德国关于二战及”柏林墙“时期的幸存者及其后代的大量研究，让我们有一定经验对于‘文革’时期的这段历史进行类似观察。”安姬·哈格说。

◇ “躯体化”与记忆病毒

凯博文将这种身体性的疼痛，称之为“躯体化”——当个体的苦痛无处排解，只能通过生理疾病的方式表达。

心理分析学家托马斯·普伦克斯始终记得时年 73 岁的老王。

老王向他形容打开记忆闸门的艰难，“除了痛，什么也没有”。往常，他从不主动想起任何过往的情节。记忆却常会自动惊醒他。

天下雪了，他会记起自己被流放的那日，当他到达院子，全身白得像雪人，只感到极度的冷。

如果是深夜，他则会想起另一个熟睡的晚上。人们冲进屋，把他从床上拉下，用皮带整晚抽打。因为流血，衬衫粘在伤口里，随后被撕掉，有人从厨房里拿盐往伤口里撒。他甚至还能清楚回放人们如何在他孩子的大米粥里撒尿的画面。

日常生活的感官刺激，都会让老王重回过往，直接通向时间另一边的现场。

“我们把这些创伤症状称作‘闪回’。”托马斯解释说，“都像定时炸弹般被埋藏起来，旁人可能根本看不出来，引爆却会瞬间发生”。

随着访谈的深入，研究者感到愈发震惊，他们将接触到的内容形容为“极度的创伤”。

创伤中首先充斥着的是各种暴力的细节：连夜审讯，剥夺睡眠，公开的羞辱，用皮带拷打，强迫脱光衣服，甚至强制性自杀……

访谈现场，这些受访人常会不由自主地落泪、抽搐，甚至昏厥、口吐白沫。回忆往事，就像“被故意揭开无法愈合的伤口”，他们会感到抑郁和愤怒的交织，伴随出现若干生理反应：失眠，焦虑，暴躁，强迫症，乃至剧烈的呕吐、头疼。

1980 年，美国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曾在湖南选择了一百个被诊断患有神经衰弱的病人进行访谈。他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曾在“文革”中遭受影响，比如家庭破碎、失业、子女离散等。有些患者则出现了各种身体上的疼痛，如偏头痛、胃痛、心血管问题……

凯博文将这种身体性的疼痛，称之为“躯体化”——当个体的苦痛无处排解，只能通过生理疾病的方式表达，“躯体化成了这一代人生活苦难的首要表达方式”。

躯体化之外，托马斯还发现老人们持续数十年与往事作战，无休止的羞愧、焦虑、紧张，以及源自生理摧残的恐惧，让他们选择了删除一部分记忆。

托马斯的受访者中，大多将自己描绘成受害者。仅有一位受访者描述了自己作为加害者的行为——她在人事档案中搜寻成分不纯的“可疑分子”，并咒骂他们。

“要承认自己曾是迫害者，意味着承担愧疚。大多数人很难做到如此。他们更习惯选择用否认和放弃来躲避这些感受。”托马斯分析。

“这些创伤，都像是被植入的电脑病毒，潜伏在系统中，伺机而动，也可能随时感染其他

的电脑。”托马斯这样形容创伤性记忆的特点，“没人能说清何时会瞬间崩盘。”

◇ 隔代感染者

阿夫·葛拉赫教授有了自己的结论：集体创伤的影响绝不只作用于亲历者，还会对其子女乃至后世数代人产生代际传递。

“伤痛是一笔遗产。”数十年研究，让阿夫·葛拉赫教授有了自己的结论：集体创伤的影响绝不只作用于亲历者，还会对其子女乃至后世数代人产生代际传递。

“幸存者的孩子生活在两个现实中，一个是自己的现实，另一个是由父母的创伤史构成的现实。”

E 是阿夫·葛拉赫的一名德国病人。

他的父亲曾为纳粹组织服务，并为德国对抗苏联的战争感到激动；而他的母亲曾是纳粹分子——这些记忆的遗产，令 E 的羞愧和绝望无处释放。

父辈的伤痛与耻辱让 E 感到自己从出生就被“惨痛地遗弃”，他把自己塑造成最绝望的人，狂躁而愤怒。

这让阿夫·葛拉赫想起另一个中国病人。1990 年代末期，这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德国写博士论文。到达德国后，他陷入长久的孤独和绝望。这让阿夫·葛拉赫困惑——这位 30 岁的年轻人，在中国颇受重视，和妻儿恩爱，把各种关系打理得井井有条，“怎么会如此绝望？”

后来，阿夫·葛拉赫发现：当他和家族分离，隐藏的父亲记忆才被激活了。“文革”期间，他的祖父被公开羞辱和批斗，祖母则被下放到离家两千里外的农村劳动改造。

接受心理治疗期间，这个年轻人缓慢而低声地哀悼、抽泣，讲述时断时续。随后的访谈显示：他的生活显现出一种典型的防御本能及处理机制——他只能不断努力工作，才能遮蔽和克服父母和祖父母被迫害的痛苦。

父辈把精神重担传递到后辈——这种影响孩子精神活动的心理机制被阿夫·葛拉赫简称为“代际授权”，最明显的创伤性后果便是损伤后代的思考及记忆能力。

“无论是德国或中国，这些案例共同的特点都是孩子陷在父辈的经历中，复制其经历的创伤，无法形成真正的自我认同。”阿夫·葛拉赫说。

阿夫·葛拉赫的理论，得到了大多数中国同行的认可。这源于他们在大量访谈中的观察。

首先被传递的是暴力：

出生于 1971 年的易女士，从小接受父亲严格的教育，她逐渐认同了怀揣坚定信仰、暴躁、攻击性极强的父亲。这直接导致了成年后的她，像昔日的父亲一样，殴打了年幼的女儿。

在托马斯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的受访者将自己的父母描述为“专横、严格、充满仇恨”，教育的恶果则会在多年后凸显而出：少年们仇恨并背叛自己的父辈，随着时间的推移，“弑父者”

却变得越来越像他的父母。暴力在悄然间传递。

随后被摧毁的，是年轻人们对家庭的看法。

出生于 1968 年的王先生，懂事后就发觉父母的婚姻是一场政治刑罚——为警方工作的父亲，在“文革”中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并被强迫与一名派去的女人结婚，她属于贫农阶级，人们认为他应该“向她学习”。

王先生在极端压抑与充满争吵的家庭中长大，他将父母的管教称为“‘文革’式的教育”：消除思想，强制服从，并且“经常被打”。

痛苦的经历，让这个男子对家庭失去了信心，成年后的他决定永不结婚，“家庭被政治主宰，这个家有什么好处呢？”

施琪嘉的学生、中国地质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生林瑶，则在访谈中遇到了一个让她意外的对象。

这个年近 40 岁的中年男子，将自己一生性格的悲剧归咎于被“文革”摧毁的童年：年幼的他，曾目睹许多人闯进家里，夺走了所有东西；原本是富家小姐的母亲，也在这场变故中变得易怒、压抑、嗜用暴力。

此后的数十年，这个男子逐渐感到自己身上缓慢而巨大的改变：他变得木讷、谨慎、敏感，更为重要的，他在潜意识中认为：有钱，就有灾难来临。

这种无法说明的恐惧笼罩着他，以至于他特别“害怕成功”，总会将一些事情刻意弄得糟糕，比如升迁，比如婚姻。

“我的整个人生都被毁了。”回忆这一切，男子声泪俱下，声音变得尖利。目睹家庭的巨变，他无法理解，也从未得到解释。林瑶突然明白了这样一点：“文革”的下一代，是更加负重累累的一代。

◇ “还不是时候”

这样的“绊脚石”就埋在受难者生前的居所的门前。其灵感来源于犹太人法典——“当一个人的名字被忘却时，这个人才算真正被遗忘。”

托马斯的父母相恋在二战中，后来住在 1949 年建立的东德，1960 年代全家迁居西德。1995 年搬进一所老房子时，托马斯发现这里战时曾是犹太人的住所。于是，像无数德国人一样，他和家人在房前的地面嵌入一块“绊脚石”。

“绊脚石”计划是由德国艺术家戴姆尼发起的——如今在德国 480 座城市的人行道上，人们已铺设了 2 万多块石块，石块的长宽高都是 10 厘米，一面镶上青铜，刻着遭到纳粹屠杀的死难者或者流放者的名字。

这样的“绊脚石”就埋在受难者生前的居所的门前。其灵感来源于犹太人法典——“当一个人的名字被忘却时，这个人才算真正被遗忘。”

2009 年，是德国庆祝柏林墙倒塌 20 周年，这成为托马斯所在的法兰克福弗洛伊德研究所一系列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起点。来到中国的日子，一切都能使托马斯联想到自己国家曾经历的一切：战争、隔绝、人性丧失以及集体共有的创伤。

“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和德国在一些历史上有着微妙的关联，这种似曾相识的体验，是我当时研究的动机。”他说。

让历史得到铭记——安姬·哈格也抱有着相同的美好愿景。2002 年，她与和中国朋友走过鲁迅公园时，迎面遇见三个学生。当她问到年轻学生们，关乎德国，能想到什么。这些孩子只说出了一个词：希特勒。

安姬感到遗憾。如同不希望德国经历的一切只被简化为一个肇事者的名字，她同样担心中国人对于“文革”的记忆也面临如此境遇。

这段记忆的挖掘确实存在困难。

为了避免引起争论，托马斯与合作的 4 个中国教授达成了协定：对其信息保密，不对外公布其具体姓名与合作细节。一些曾参与“文革”心理创伤研究的学者，也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还不是时候”。

施琪嘉也曾记得，许多年前，国内著名的一个精神科前辈说：沤肥的大便不臭，你为何要挑起来臭？“他的意思是，过去的事情忘记就忘记了，没有必要再提。”

而他的学生林瑶也遭遇了相似的困境：访谈时，一个“文革”亲历者愤怒地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来质问她：是否真心想要了解这些故事？

林瑶将他的抗拒归咎于屈辱：“从来没人为他们的伤痛说句话。他们希望有人真正的去感受他们的感受。”

林瑶的记忆里，也并非只有困难。这个出身于 1990 年的女生，访谈中无意得知了自己家庭的秘密：她的爷爷曾在文革中遭遇不公。

此前 23 年，她的爷爷，却从未想到告诉她这一切。现在，“一切都是个良好的开始，我开始去了解父辈的更多。”

而对于心理医生吴莉（化名）来说，研究“文革”，是为了重新面对心中的创伤。

她的父亲曾是北京的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在“文革”中因被打成“右倾分子”，自杀身亡。那年，吴莉 12 岁。

后来，吴莉成了一名内科医生，给病人治疗的过程中，发现他们除了躯体上的创伤，还会有心理上的创伤，于是一边工作一边把临床心理学读下来，成了一名心理咨询师。

而她始终有遗憾，不能再与父亲说话，也无法治疗父亲心中的伤。后来，她想通了，“我其实想治疗的是我自己。”

□ 原载《南方周末》2013 年 7 月 18 日

~~~~~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九）

• 孙怒涛 •

〔上接 z k 1 3 0 8 c，第七章 4 1 4 的外战和内斗（1 9 6 7． 6 — 1 9 6 8． 9）〕

第四节 414 究竟有没有后台？疑似康生、周恩来、林彪

到底 414 有没有后台，这在两派争斗时是个特别吸引眼球的话题。

团派的一些朋友一直强烈怀疑 414 是有后台的。最合情理的逻辑是：明明知道中央文革是坚定地支持团派的，蒯大富作为反刘少奇有功的学生领袖是为毛泽东所欣赏的，414 要是没有强有力的后台做支撑，敢这样顽强地明目张胆地对抗团派吗？还有一种最没头脑的逻辑是：文革中的造反派要是没有后台连一天都生存不了，414 要是没有后台是不可能的，只不过这个后台太厉害了没有被揭露出来而已。

对于 414 有没有后台，当年有些老四也心存疑虑。有人曾当面问过我，要我向大家老实交底 414 究竟有没有后台，不得有任何隐瞒。

如果说当年团派从上到下都怀疑 414 有后台，我还能理解的话，在四十余年后的今天，还有那么几位团派朋友一口咬定 414 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的目的就是指使 414 搞垮蒯大富，进而破坏文革。他们被这个臆想中的后台搞得神魂颠倒，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寻这一历史“真相”，想挖出 414 的后台。就在几年前，有位团派朋友曾当面向我征询：“老孙，现在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你说一句实话，414 究竟有没有后台？如果有，现在说出来已经无关大局了，只是让我们知晓了谜底而已。”

我除了吃惊和好笑，真的是无言以对。

什么是后台？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没有一个准绳，就无法讨论，只能各说各的。我心里有一个自定的标准。我认为，一个大人物要成为一个派别组织的后台，至少应该同时符合下面三个条件：

- 1、这个大人物要有巨大的政治能量足以对这个派别支持、保护、甚至庇护；
- 2、这个派别对这个大人物基本上是言听计从的；
- 3、这个大人物与这个派别之间有着某种比较直接的或紧密的联系以及有相互关联的政治利益。

当年，团派没敢公开挑明他们所怀疑的 414 后台是谁。因为要是被 414 抓住把柄，那是很被动的东西。我从团派的议论中，感觉他们怀疑的 414 后台，主要集中在康生、周恩来、林彪身上。我要一一谈谈他们与 414 的关系，他们对 414 的影响，414 对他们的看法。他们三位都有巨大的政治能量，符合做后台的第一个条件。那么他们是不是 414 的后台呢？

康生——

之所以怀疑康生是 414 后台的主要依据是因为 414 总部核心陈楚三是康生的养子。此外，1967 年初，社会上（如中央党校的“红战团”）有一股反康生的暗流。兵团总部支持“调查”康生问题，“28 团”反康最为积极，还有好些战斗组也参与其中 77。团派怀疑康生是不是因为此事记仇因而暗中支持 414。康生时任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顾问，地位显赫，确实完全具备做后台的资格。如果他是后台，当时也是红后台，不是黑后台。正因为“陈楚三是康生养子”在清华是一个路人皆知的“秘密”，所以我对陈楚三的言谈特别注意，也保持着足够的警觉。无论在总部会议上，在公开集会上，还是在底下的交谈，我从来没有从他嘴里听他提起过康生哪怕一次。退一步说，即使康生对他有过指示，他没提这是康老指示，而是用他自己的话说的，我都把这当做陈楚三个人的意见来决定我是赞同还是保留的。也就是说，在我眼里，康生是康生，陈楚三是陈楚三。我从来没有因为“陈楚三是康生养子”这个身份而要额外考虑陈楚三的话是不是康老的指示什么的。

怀疑康生是 414 后台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传说康生是地派的后台，而 414 被划入地派阵营了。即便康生是地派的后台，因为 414 与地派的关系非常疏远，硬要把康生说成是 414 的后台，显然是过于牵强附会了。

我本人对康生并没多大好感。原因很可笑。在我第一次受中央首长接见的时候，我看到康生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人太阴沉了，太有城府了，深不可测，我的感觉很不舒服。当然，我对这位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央首长，完全没必要为这点“理由”反他或保他。

2011 年 4 月下旬，在两派头头和骨干参加的宛平聚会上，我与陈楚三都被邀参加了，并同处一室。那晚，我问他与康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也是几十年来我第一次这么直白地询问他。陈楚三也是多年来第一次参加两派聚会。在会上会下，我这个问题同样被其他的老团朋友问了不少四五次。4 月 26 日下午，他在会上给大家作了一次详细的解释。他说他上学时住在康生家，与康生一家很熟。曹轶欧（康生夫人）曾向他提起过想认养他，但是他没回应，此后他与康生一家都不再提起这件事情了。文革中，他确实通过康生家的门卫提交过几次材料，但康生从来没有给他回复或回音。这是陈楚三亲口对与会者所做的最权威解释。他后面说的这点我也从他在 414 期间从来没提起过康生得到印证。我听到身旁有位团派朋友喃喃自语地说：看来老四真的没有后台。陈楚三的亲口解释终于让他释了疑。

其实，陈楚三的说法早就在沈如槐的回忆录中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了世人：“陈楚三明确地跟我说，他不是康生养子，虽然曾经给康生写过几封信，可从来没有回音。”看来，团派的朋友只有亲耳听到陈楚三的亲口说法才真正相信了。

周恩来——

在周恩来亲来清华接见蒯大富，与他长谈几小时并在全校大会上亲自为他公开平反的时候，我想蒯大富对周恩来肯定是感恩戴德的。后来随着中央文革越来越密地插手清华文革，周恩来慢慢地淡出了。

激进的蒯大富亲江青而远周恩来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他对周恩来不满的第一次公开暴露是在揪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的问题上。周恩来一是恪守中央决定始终不放王光美回清华，二是严厉批评蒯大富骗斗王光美“是背后捣鬼，不是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蒯大富心里是一百个不服气，以“智擒王光美”的大吹大擂来发泄他对周恩来批评的严重不满。

当然，这件事发生在 414 之前，与 414 无关，但是种子已经种在后来成为老团老四们的心上。

蒯大富破釜沉舟铁了心要在 5.30 成立革委会。他对革委会可能流产的思想准备一点点都没有。鉴于 414 宣布成立总部，分裂局面已经形成，原本答应来参加清华革委会成立大会的周恩来不来参加成立大会了，建议革委会延期。这对蒯大富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如“当头一棒，一盆冷水”。78 打击之大，可谓空前。

5·30 革委会的流产，在蒯大富的心里结下了两个大大的仇。一个是对内，对 414 的。另一个对上，对周恩来的。如果说，之前的蒯大富只是对周恩来的思想太保守，没有像江青那么激进有看法的话，这一次是在重大的切身利益上受到严重的创伤。

我原来一直以为，周恩来不来参加大会是革委会无法如期召开的唯一原因。现在才知道，即使周恩来不来参加大会，谢富治参加大会的态度依旧没变。也就是说，如果蒯大富决心如期成立革委会的话，这个庆祝大会还是开得起的。谢富治陪着蒯大富思前想后纠结了一晚上，最终蒯大富选择了推迟。这一推迟，就推到遥遥无期，清华革委会再也没有在蒯大富的手里成立起来。

不管怎么说，周恩来决定不来参加成立大会是革委会流产的最重要外因。414 的感受是“天神相助”，客观上是帮 414 扭转了危局。但是周恩来绝非为了帮 414 才把革委会搅黄了的。他的决定是从对大局的考虑出发的。至于 414 因此而挣脱困境，仅仅是他这一决定的副产品。

蒯大富认定周恩来在关键时刻不动声色地给 414 以最有力的支持和最默契的配合，这就是 414 后台的“铁证”。团派的其他头头、骨干和群众，从上到下都深度怀疑是周恩来利用 414 搞垮了蒯大富的革委会。有一位团派朋友勾勒了这样一张“路线图”：在 414 与周恩来之间的关键人物是张广友。是他代表周恩来的意图支持 414 分裂。我认为，作为一种想象，无论听起来是多么的“合情合理”，只能是想象，而不是事实。414 分裂是团四深层次矛盾发展的结果。内因是根本。作为 414 分裂的决策者之一，我确实没有感觉有什么外在因素对我产生影响。

用不着否认，414 与周恩来之间是有上下互动关系的。这种互动体现在思想上，体现在情感上。

414 对周恩来的态度，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亲”。我们自认为四一四思潮与周恩来的思想体系是很合拍的、一致的。他的一言一行，我们十分关切。他的困难处境，我们十分同情。他在上层与中央文革这帮人艰难周旋，我们在清华园与团派的极左思潮艰苦抗争。我们自我感觉就是与他上下呼应。

我们“亲”周恩来的另一个因素是带点派性的。在中央首长中，除了不过问清华文革、对清华两派都没表过态的那些以外，凡是表过态的，都是站在团派这边打压 414 的。对 414 公开指责，敲敲打打，那是家常便饭。唯有周恩来，没有公开指责过 414，这就足够令我们心存感激了。我猜想，周恩来的内心对蒯大富这样的极左势力也是不抱好感的。对于 414，他不参与江青等压制 414 的大合唱，我们感觉是他对 414 所能做的最大支持了。

至于周恩来对 414 的态度，我们只能从蛛丝马迹中去感觉。对于清华的 414 与团派，乃至全国的温和造反派与激进造反派，显然，周恩来对前者的好感更多一些。周恩来尽力保护老师、副总理这些他在中央的支持者，那么他也会尽力照顾作为他的社会基础的温和造反派。414 参与“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行动后传来消息，说周恩来说了一句“没想到清华 414 也参加了。”这是一句批评的话，夹杂着失望和惋惜的情绪，也可以解读成他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 414 一直存有的好感并寄予希望。我们听到以后，因没能为总理争光反而给总理添乱感到非常的内疚和惭

愧，着实难过了好一阵子，懊悔无比。

作为中国政坛的第三号人物，周恩来有做任何一派后台的实力和资格。但是，周恩来是个努力紧跟毛泽东、按党性原则办事的大人物。他知道蒯大富是毛泽东欣赏的，中央文革支持的，所以他绝对不敢也不会违背这个大原则公开支持 414。在“414 串联会”成立半个月后的 4 月 28 日，当有人问他知道不知道清华有个 414 时，周恩来说：“不知道，清华我就知道有个井冈山，只认识一个蒯大富。”是周恩来确实不知道清华冒出了个 414，还是他佯作不知，这无从考证。从周恩来的绝妙回答中，我们看到了他的过人之处，他是绝对不会在这样的事情上授人以柄的。

周恩来对清华两派的态度，表明了他坚持不亲一派打一派的党性立场。他对团派、414 都有过批评。而态度明确的支持，他只给了“井冈山”，起码表面上是这样。

如果说，我们对毛泽东是敬畏的话，那么对周恩来是敬仰，是敬重，带点亲切感。我是反对找靠山找后台的。但是，如果周恩来敢于做、愿意做 414 的后台的话，我是心甘情愿拥戴他这个后台的。414 上下也会非常乐意的。但这终究不是现实。我可以这样说，在我们的心目中，周恩来只是 414 的精神后台。

林彪——

说实话，当年，及以后的几十年来，我从来没想过老团中居然会有人怀疑林彪是 414 的后台。近年才知道，有为数极少的几个团派朋友认为林彪是 414 的后台。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所有的造反派唱的都是毛主席的语录歌，唯有 414 选用林彪语录作为 414 战歌，说明 414 对林彪崇拜到何种程度。二、两派为这段林彪语录的真伪互相激烈争辩。正当因吴法宪、戚本禹否认这是林彪语录，414 处于十分被动地位的时候，林彪办公室为这段未正式出版的林彪语录证实，从而替 414 解围，而让团派颜面扫地。团派朋友说：“这样的做法不是令人深思的吗？可见 414 与林彪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以此证明林彪就是 414 的后台。

我看了，不禁哑然失笑。林彪在文革中深居简出，几乎没有插手过地方上的事情。414 与林彪，简直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关系。我只是想说，如果哪个大人物曾经说过几句并非主观故意对 414 有利的话或做过某件有利的事，他就成了 414 的后台，或者 414 就认他做自己的后台，那这个“后台”的桂冠也太不值钱了，以这样来认定后台也太小儿科了。

因为绝大多数老团都认为怀疑林彪是 414 的后台是可笑的，所以我也简单略过，不再多议。

团派曾经强烈怀疑林杰 79 是 414 的后台。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专门有一节“后台风波”记述此事，我不再赘述了。

尽管团派只能怀疑而不能确证 414 的后台是谁，团派还是坚信 414 是有后台的。这样的执迷不悟几乎达到走火入魔的程度。当毛泽东派出三万首都工人来清华制止武斗的时候，正常人的思维是在毛泽东的眼皮底下谁也不敢蒙着毛泽东调动工人来清华的。蒯大富在无法从谢富治的北京市、江青的中央文革处求证是谁派出这庞大的工人队伍的情况下，认准是 414 的黑后台所为，公然武力抗拒工人。某种意义上说，蒯大富是被自己臆造的“414 后台论”断送的！

除了后台外，团派还怀疑过张广友、罗征启等人是伸向 414 的黑手。尤其是对罗征启，被团派列为“罗文李饶”80 之首，认为只要把这些亮相到 414 的干部打成“反革命集团”，是他们在背后操纵着 414，414 就会不攻自破了。

说到底，团派对 414 从根本上还是不了解。可以那么说，即使团派所说的那些后台真的都倒台了，团派所说的那些黑手真的是反革命的黑手，414 也不会因此而垮台、而瓦解的。因为我们心里非常清楚，414 的重大决策都是我们自己决定的，外界的影响有，但绝不是主要的。与 414 多少有点关系的黑后台打倒了，或者黑手揪出来了，这最多会让 414 有点一时的被动，但是想要以此整垮 414，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在那个时候重提一件蒯大富的往事，可能对团派是会有所启发的。

当蒯大富和蒯派们挑战工作组权威的时候，当工作组凭借党的名义倾全校之力围剿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后台，没有背景，没有援手，凭什么这样硬气和无畏？那是因为他们敢于独立思考，他们坚信自己没有大错，更没有罪，工作组这样整群众是方向错误，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凭着这样的信念，他们才坚持到了“解放”。

多数 414 头头在工作组时期的政治勇气和独立精神显然不如蒯大富和这些蒯派们。但是过了不到一年，两者互换了位置。已经成了 414 头头的沈如槐等人，他们明知道蒯大富是毛泽东所欣赏的红卫兵领袖，明知道清华《井冈山》是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典型，但是他们更知道蒯大富等人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不断违背着毛泽东思想。他们不畏江青、谢富治等人的权势和高压，敢于独立思考，表现了极大的政治勇气。曾经英勇的处于掌权派地位的蒯派们，此时却迷信和依附中央文革，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当年没有后台敢冒犯工作组的蒯派们，为什么不相信没有后台的 414 因为同样的理由敢于与团派抗争到底呢？

## 第五节 我认为的团派后台：谢富治、江青、毛泽东

团派有后台吗？

当然是有的，而且都是强大给力的红后台。至于有的后台后来颜色变了，由红变黑了，那是在两派都消亡以后的事情。

团派的后台是谁呢？在我看来有三个：

一是谢富治——

作为北京市党政军一把手，更兼公安部长，清华又在他的直接管辖之下，具有足够的政治能量对团派支持和保护。谢富治的屁股坐在蒯大富一边，蒯大富没有理由不听谢富治的话，他也是很看重谢富治这个后台的。只是，蒯大富自恃是毛泽东的“宠儿”，并不从心眼里完全服了谢富治。对于谢富治不顺自己心意的话也是不听的，因为蒯大富有比谢富治更硬的后台，所以只有在合意时才言听计从。谢富治从支持蒯大富中向伟大领袖邀功表忠心，蒯大富需要由谢富治出面向 414 施压，他们各有政治利益所图。

谢富治在蒯大富成立革委会以及抓陈楚三、周泉缨这些事情上把他的后台角色表演得淋漓尽致。

二是江青——

江青不仅是中央文革的实际掌门人，更有“毛泽东夫人”这一无人能及谁都忌惮的身份。



蒯大富对江青是敬畏的，完全做到了言听计从。对蒯大富来说，听江青同志的，就等同于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同是后台，谢富治见到江青，那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两者不在一个档次上。

蒯大富在打倒刘少奇上建立了奇功。蒯大富两次批斗王光美，让王光美出尽了丑，江青快意无比。所以江青对蒯大富犹如自家孩子一样的呵护和疼爱。

怪就怪在，我们都明明白白知道团派有江青、谢富治这样权高位重的中央首长做后台，我们还是公开与团派对抗。为什么有这个胆量？因为我们以自己理解的毛泽东思想来衡量团派的所作所为。团派有许多错误，我们反对的是团派和蒯大富的错误，并不是团派和蒯大富的全部。因为我们只是对江青、谢富治庇护蒯大富错误的言行表示不满，而不是反对江青、谢富治，更不是反对中央文革、反对北京市革委会。这是我们牢牢掌握的原则。团派以为我们有后台才敢于反对蒯大富，这完全是错误的判断。我们是因为自认为站在真理一边，我们的所作所为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才敢这样理直气壮地对抗蒯大富，尽管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蒯大富的背后站着江青、谢富治。

除了谢富治、江青，想做团派后台的，还大有人在。如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就是其中之一。1967年6月26日，他带戚本禹来清华找两派做工作，竟然对团派说“要承认414（总部）么，承认了对你们主动。……（团四两派要）以对等原则召开联席会议，采用联席会议的形式共同决定一切问题”。当我们终于从他非常难懂的福建话中听明白他的意思时，我们欣喜若狂，犹如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馅饼。这“承认414”、“对等原则”都让团派老大不高兴，因为这把他们的核心利益全出卖了。陈伯达来清华的本意是想帮团派忙的，只因为事先不了解情况，结果帮了倒忙。后来陈伯达忙着为自己的失误补救，团派心里依旧有气，414也没领他什么情，心里骂他搞两面派。陈伯达似乎也是很想当团派后台的，但他这样笨拙和迂腐，团派岂能看得上？

至于戚本禹这位曾经红得发紫的人物，也应该算是团派的后台。但是在蒯大富眼里，真没把他当做一回事。即使是后台，也是小小不言的小角色。

每当与团派多多少少有点牵连的大小人物，譬如像王、关、戚，杨、余、傅81倒台的时候，414都要鼓噪一阵，说这些人是团派的后台。其实，这些人与团派即使有一点关系，相比较江青、谢富治这样的真后台，也是比较浅表的。

### 三是毛泽东——

毛泽东对蒯大富的宠爱和支持，这点大家都有目共睹的，也是我们心知肚明的。但是这种支持，是对造反派支持的体现，属于比较正常范畴。所以，我在两派争斗期间，一直都没有认为毛泽东是团派的后台。如果那个时候就确定毛泽东已经是团派的后台，起码我是不会再搞414的了。跟以毛泽东为后台的团派争斗，岂不是自己找死？

直到看到毛泽东7.28召见谈话之后，我才猛然明白，原来团派的背后真还站着一个巨无霸的后台——毛泽东。

毛泽东对包括蒯大富在内的五大领袖说：“我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我们有偏向”。

对于派工人进清华一事，毛泽东对蒯大富说：我这是来为你解困，“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

召见结束，毛泽东离开了又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他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

而对于 414，毛泽东的表态和定性是：“我才不高兴那个 414。那个 414 是反对我的。”

作为所有造反派的领袖，毛泽东对某个具体的造反派组织极少公开表态。他表面上是维持一碗水端平，不给外人留下抬一派压一派的印象。但是这次，毛泽东的态度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支持。犯下严重错误的团派得到他无原则的庇护，欢迎工宣队制止武斗的 414 则受到他毫无道理的指责。在团派开枪打死了工人、蒯大富犯了罪行的危难关头，关键时刻，毛泽东不得不拉下公允的假面，放下高贵的身段，把团派后台的身份暴露得一览无遗。

团派真的好“幸福”！有那么大、那么多的红后台的坚决支持，着实令我有一丁点儿“羡慕嫉妒恨”，外加巨大的压力。

在文革之前，我们津津乐道于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是多么的英明团结。文革开始后，铁幕洞开，神话破产，我们震惊地发现他们之间有那么大的矛盾那么深的裂痕已经达到你死我活的白热化程度。

文革爆发前夕，毛泽东林彪已经结为同盟站在一起。刘少奇邓小平并非是同盟但客观上被划为一起。既敬服又畏惧毛泽东而思想上却与刘少奇有更多共鸣的周恩来最终站到毛泽东这一边。

中央高层的分歧必然会“投射”到社会基层。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这三个代表人物必然会有三种相应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势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代表人物都是他们相应的社会基础的“后台”（指利益代表和精神层面而言的后台）。在全国，刘少奇是保皇派的总“后台”，毛泽东是激进造反派的总“后台”，周恩来则是温和造反派的总“后台”。在清华，刘少奇是“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后台”，毛泽东是团派的“后台”，周恩来则是 414 的“后台”。

派别以“后台”作为政治利益的代表，因而衷心拥护、积极支持。“后台”以派别作为他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因而悉心呵护、全力支持。这方面，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与清华的老红卫兵、团派、414 之间的关系莫不如此。但是，因为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在政治势力和能量上并非是等量级的，所以，他们与派别之间关系的表现形式上是有差别的。刘少奇通过王光美、刘涛这样一条线成为“清华大学红卫兵”真正的后台。毛泽东通过江青（中央文革）这样一条线成为团派真正的后台。周恩来与 414 之间没有这样一条线。周恩来对 414 的支持只能在力所能及且有充分正当的理由下才做那么一点点（最经典的一次是以清华没有实现大联合为由拒绝参加革委会成立大会客观上给 414 以极大支持）。414 对周恩来的拥戴也都在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口号下呼应的。

团派始终强烈怀疑周恩来是 414 的后台。相比较怀疑康生、林彪等是 414 的“后台”，团派怀疑他是 414 后台算是最靠谱的。但是，靠谱也只是靠近一点谱，并不是真的就等于谱。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3 年 2 月第一版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